

# 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特征、机制与调适路径

胡佳怡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4日

## 摘要

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正发生深刻变革。本研究以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孝道二元模式为框架，结合丁克家庭、隔代抚育、全职儿女等形态展开实证分析，系统分析转型期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特征、形成机制与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代代际关系呈现权力结构重构与情感联结延续、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个体化交织的核心特征，其变迁源于生育观念转变、资源分配调整与伦理价值重构。通过对团结、解放、复制、原子化四种模式的考察，研究提出应构建以平等协商为基础、情感联结为核心、多元支持为保障的代际关系调适路径，为推动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 关键词

社会转型，代际关系，家庭变迁，代际支持

#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Adjustment Paths

Jiayi Hu

School of Social Work,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May 6, 2026; published: May 14, 2026

文章引用：胡佳怡. 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特征、机制与调适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5): 36-43.  
DOI: 10.12677/ar.2026.135223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low fertility rate and population a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mbivalence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dual-model of filial piety,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incorporating such family forms as DINK families, skipped-generation caregiving, and full-time adult children.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formativ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study finds that contemporar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re featured by the restructuring of power structure alongside the continuation of emotional bonds,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traditional familism and modern individualization. Such changes stem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rtility attitudes, the adjust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values. Through investigating four patterns—solidarity, liberation, reproduction and atomization—the study proposes an adjustment path fo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at is built on equal negotiation, centered on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guaranteed by diversified support,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 Key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Family Chang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问题的提出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代际关系兼具血缘延续与情感传递功能,亦能反映社会结构变迁逻辑。随着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加速与生育政策调整,传统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型,丁克家庭、隔代抚育家庭、全职儿女家庭等多元家庭类型不断涌现[1]。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代际居住模式、权力关系、责任伦理与互动方式深刻重构,既形成“孝而不顺”的新型亲密关系,也面临着生育观念冲突、养老责任分担、资源分配不均等多重矛盾[2]。

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维度,涉及家庭中不同世代间的资源传递、情感交往与权力互动,其和谐稳定直接影响家庭功能实现与个体福祉提升。近年来,“啃老”“养老矛盾”“生育观念分歧”等议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反映出转型期代际关系的张力与困境。在低生育率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双重背景下,老龄化进程中的代际支持模式、个体化趋势下的家庭伦理重构、生育决策中的代际协同与博弈机制等问题,亟需系统性探讨[1]。

既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考察代际关系变迁:部分研究聚焦代际支持的形式与效果,探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代际流动特征[3][4];另一部分研究关注特定家庭类型的代际互动实践,如丁克家庭的生育观念冲突[1]、隔代抚育中的权力博弈[5]、全职儿女的代际互惠逻辑[6];还有研究从孝道观念变迁视角,分析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的此消彼长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3]。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对代际关系变迁的整体性把握不足,多聚焦单一家庭类型或单一维度,缺乏对不同家庭形态代际关系共性特征与差异逻辑的比较分析;二是对代际关系变迁的内在机制阐释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揭示结构因素与个体选择的互动过程;三是对代际关系调适路径的探讨较为笼统,缺乏针对性

与可操作性。

基于此，本文整合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从变迁特征、生成机制、实践模式与调适路径四个维度，系统构建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丁克家庭、隔代抚育家庭、全职儿女家庭等典型案例，揭示当代代际关系的“变”与“不变”，为理解中国家庭变迁规律、化解代际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相关家庭政策制定提供现实参考。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演进与多元整合

代际关系研究理论呈现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整合的演进趋势[7]。早期西方代际团结理论聚焦成年子女与父母间情感、经济、功能等方面的紧密联结，视代际支持为家庭凝聚力核心，但忽视代际矛盾与冲突；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代际团结-冲突模型”，指出代际互动中团结与冲突并存的动态特征[1]。

20世纪90年代，卢休的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为理解复杂代际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代际间存在积极与消极情绪共存的矛盾状态，其源于社会结构性因素与个体化进程中的价值变化。在丁克家庭中，亲代对“传宗接代”的诉求与子代生活选择的冲突是其典型体现[1][8]。

孝道二元模式理论从文化伦理视角切入，将孝道分为强调辈分规范与绝对服从的权威性孝道，以及注重代际平等与情感互惠的相互性孝道[3]，为转型期孝道观念的分化提供解释。

此外，家庭策略理论认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家庭会主动调整代际互动与资源分配策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6]，可解释隔代抚育、全职儿女等家庭形态的代际关系差异化选择[5][6][9]。

### 2.2. 文献回顾

#### 2.2.1 代际关系变迁的宏观特征

现有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权力结构从“父为子纲”的垂直型关系向“平等协商”的横向型关系转变，子代的家庭决策权显著提升[10]。二是代际支持从单向反哺模式转向双向互惠模式，亲代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子代对亲代的精神慰藉成为核心互动内容[3][4]。三是伦理价值从传统家庭主义向“新家庭主义”演变，兼顾家庭利益整体性与个体自主选择[2]，康岚将其概括为“代差与代同并存”[11]，相关调查也印证了个体独立与家庭责任的共存[12]。

#### 2.2.2. 典型家庭形态的代际关系实践

丁克家庭的代际矛盾核心是生育观念差异，亲代“传宗接代”传统伦理与子代“个体自主”现代价值观形成张力，双方均存在心理纠结[1]，可通过心照不宣的团结、坦诚沟通等策略实现动态平衡，其丁克观念受原生家庭、同辈群体等多因素历时性影响[8]。

隔代抚育家庭的代际关系呈“依赖与冲突并存”的特征，亲代承担主要育儿劳动，子代掌握育儿决策权，形成“严母慈祖”格局[5]。这种分工虽缓解子代压力，但易因育儿观念差异、权力边界模糊引发冲突[7]且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需代际支持中介实现[4]。

全职儿女家庭以“异时性互惠”为核心，是青年应对就业困境的阶段性选择，亲代提供经济与空间支持，子代以家务、陪伴及养老照料回报[6]，其区别于“啃老”，蕴含代际伦理再造与情感共鸣，具备长期稳定性。

#### 2.2.3. 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因素

代际关系变迁是结构因素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层面，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家庭规模小型

化,“4-2-1”结构加剧代际资源向下流动[10],社会化托育服务不足与养老保障不完善,强化了家庭代际互助功能[4][5]。个体层面,青年教育水平提升增强其个体意识,改变对传统代际责任的认知[3];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则延长了代际互动周期,深化了资源交换与情感联结[6]。

既有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但仍有拓展的空间。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家庭类型或特定维度,缺乏系统性整合;对变迁机制的分析偏描述,未能充分揭示因素互动逻辑;调适路径侧重宏观政策,缺乏家庭微观实践指导。基于此,本文将在整合现有研究,构建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探讨代际关系变迁的核心机制与有效调适路径。

### 3. 社会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特征

#### 3.1. 权力结构转型：从“父权主导”到“双向协商”

传统家庭中,亲代凭借经济控制权与伦理权威占据代际主导地位,子代遵循“父为子纲”规范,形成垂直型权力结构[2]。社会转型期,该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子代经济独立性增强,尤其是城市青年通过教育获得职业优势,瓦解了传统父权的物质基础[1];同时,个体化进程提升子代的权利意识,其更倾向于以平等身份参与家庭决策,挑战亲代的绝对权威[2]。

丁克家庭清晰展现这一变迁,青年夫妻的不生育决定多以“通知”而非“请示”告知亲代,亲代虽可能反对但缺乏有效干预手段,最终多妥协[1]。这种“子代主导、亲代让步”的格局也存在于隔代抚育家庭,子代凭借育儿知识与决策权主导教养方式,亲代则为辅助者[5]。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代际权力结构并非“子代夺权”,而是形成“双向协商”新型关系[2]。亲代虽无绝对权威,但凭借生活经验、社会资源与情感联结仍具影响力。如全职儿女家庭中,亲代以经济支持换取照料,子代则尊重亲代意愿[6],这种重构本质是传统伦理权威向现代情感权威的转型。

#### 3.2. 互动模式演进：从“责任强制”到“情感互惠”

传统代际关系以“责任伦理”为核心,亲代抚育、子代赡养是强制性单向道德义[3]。转型期,代际互动伦理基础从“责任强制”转向“情感互惠”,代际支持成为基于情感联结的自愿行为[6]。

孝道观念的变迁印证了这一趋势,丁志宏等研究显示,城市青年更认同相互性孝道,注重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与相互理解,而非单纯物质供养与绝对服从[3],“情感优先”让代际关系更具包容性。

代际互惠的形式日益多元[4],除传统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外,情感陪伴、文化反哺等新型形式涌现。隔代抚育家庭形成“知识反哺-育儿支持”循环[5],全职儿女家庭实现子代照料与亲代情感陪伴的心理互助[6],适配现代家庭的发展需求。

#### 3.3. 伦理价值重构：“家庭本位”到“个体与家庭共生”

传统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个体的发展需服从家庭规划,代际关系核心是维护家庭延续与和谐[2]。随着个体化进程推进,“家庭本位”伦理松动,个体自主选择与自我实现得到重视,形成“个体与家庭共生”的新型伦理观[6]。

这种伦理转型在丁克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青年夫妻不生育的选择是个体生活方式对传统家庭责任的突破,他们重视家庭情感功能,又不愿因生育牺牲个人发展[1],追求个人与家庭利益平衡,体现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2]。在全职儿女家庭中,青年暂时回归家庭是将其作为缓冲空间,在接受亲代支持的同时寻求职业转型[6],生动体现个体与家庭的共生关系。

伦理转型未导致家庭主义消亡,而是呈现新形式。阎云翔提出的“下行式家庭主义”指出,家庭资源向孙辈集中,亲代与子代围绕育儿形成合作[10]。在隔代抚育家庭中,亲代承担育儿责任,子代专注职

业发展,是家庭成员为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分工[5],保留了传统互助精神,适应了现代社会需求,成为当代代际关系的重要伦理基础。

### 3.4. 居住模式与互动频率变化:从“共居紧密”到“分居弹性”

传统家庭以代际共居为主,亲代与子代互动紧密[2]。城镇化与住房条件改善后,同城不同居、异地分居成为主流,代际互动呈现空间分离、情感联结的弹性特征。齐鑫指出,丁克家庭均独立居住,既保障子代独立、减少摩擦,又通过探望与数字媒介维系情感[1];郑杨等发现,隔代抚育家庭多就近居住,兼顾抚育便利与生活独立[5]。居住分离未降低代际互动质量,反而推动沟通形式多元化,数字媒介成为重要载体[4][13]。李鹏等证实,居住距离与代际支持呈互补关系,远距离更易提供经济支持,近距离更易提供生活照料,分居家庭仍可维持紧密稳定的代际关系[4]。

## 4. 代际关系变迁的生成机制

### 4.1. 生育观念转型:代际矛盾的核心诱因

生育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核心环节,其观念变迁是引发代际关系矛盾的关键。传统生育观念以“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为核心,将生育视为子代的伦理责任,亲代对孙辈的期盼兼具情感需求与家族延续的文化使命;现代生育观念则以“个体自主”“质量优先”为特征,青年将生育决策与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紧密结合[1]。

这种差异在丁克家庭中形成尖锐冲突:亲代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将子代不生育视为“不负责任”“违背伦理”;子代则重视生活自主选择,认为生育与否是个人权利,不受传统伦理约束。这种观念冲突可通过代际沟通协商缓解,沟通不畅则可能引发长期矛盾[1]。

生育观念转型还推动代际责任伦理重构[2]。传统社会中,生育与养老直接挂钩,亲代抚育子代旨在获得晚年赡养保障,形成“抚育-赡养”的责任闭环[3];现代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亲代养老不再完全依赖子代,生育的工具性弱化、情感性凸显[4],使代际责任关系更灵活,减少强制性并注入更多情感元素[6]。

### 4.2. 资源分配调整:代际权力的重构基础

资源是代际权力的核心基础,其分配格局直接决定权力关系走向。传统社会中,亲代掌握土地、房产等核心资源,子代生存发展高度依赖亲代,构成父权权威的物质基础[2]。社会转型期,资源分配格局发生根本转变,子代通过教育获得人力资本优势,经济独立性显著增强,传统资源依赖关系逐渐瓦解[1]。

城市青年的经济优势使其掌握更多代际话语权。丁志宏等研究表明,城市青年的受教育水平高于亲代,职业收入增长快,多数能自给自足,还能为亲代提供经济支持[3]。这种经济地位的逆转推动代际权力从“亲代主导”转向“子代主导”。在丁克家庭中,子代凭借经济独立坚定维护不生育选择[1]。

资源分配调整还体现在代际支持的方向与形式上[4]。传统代际支持以子代对亲代的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为主[3],现代社会则呈现双向流动特征,亲代对成年子代的经济、育儿支持成为重要内容[5]。这种“向下支持”的增强,使代际关系转向双向互惠,权力结构更趋平等[6]。

### 4.3. 伦理价值重构:代际互动的文化内核

伦理价值作为代际互动的文化基础,其重构深刻影响代际互动逻辑[2]。传统代际伦理以“孝道”为核心,强调子代对亲代的绝对服从与赡养责任,形成“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3];现代代际伦理则以“平等”“尊重”“互惠”为核心,强调代际相互理解与情感共鸣,形成“孝而不顺”的新型伦理关系[2]。

孝道二元模式的变迁清晰反映了这一重构：权威性孝道要求子代压抑个人需求迎合亲代，而相互性孝道基于情感联结与互惠，更契合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3]。

伦理重构还体现为家庭主义内涵的更新。传统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利益至上[2]，现代家庭主义则兼顾家庭利益与个体自主[6]，实现代际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2]。

#### 4.4. 社会结构变迁：代际关系的外部推力

社会结构变迁为代际关系转型提供外部推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人口流动频繁，地缘与血缘网络被打破，家庭规模小型化[2]，核心家庭增多使代际居住距离扩大，互动更注重情感联结而非形式[1]；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抚育-赡养”契约松弛[4]，为子代自主选择提供了空间，增强代际关系弹性[6]；三是社会化服务滞后，托育与养老服务短缺，强化家庭代际互助[5]，隔代抚育与家庭养老仍是主流，维系代际相互依赖[4]。

此外，社会结构变迁还影响代际角色期待与行为规范。传统亲代为“抚育者”“管理者”，子代为“被抚育者”“服从者”，规范明确[2]；现代亲代转变为“支持者”“陪伴者”，子代转变为“自主决策者”“回报者”，规范更灵活[6]，代际互动更平等，冲突多源于观念差异[1]。

### 5. 代际关系的实践模式与调适路径

#### 5.1. 代际关系的四种实践模式

基于卢休的代际矛盾心境处理理论，结合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1] [14]-[20]，当前我国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差异化的表现形态，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实践模式，具体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Four practical mod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表 1. 代际关系的四种实践模式

实践模式	核心特征	典型实践场景	优势	不足
团结模式	以默契规避矛盾、保留观念，核心为“向下团结”	丁克家庭：以“避而不谈”维系关系稳定	避免直接冲突，维系代际情感联结	矛盾未真正解决，特定情境下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解放模式	通过坦诚沟通化解矛盾、求同存异，核心为文化反哺与平等协商	1) 全职儿女家庭：亲代支持、子代照料的互惠关系；2) 隔代抚育家庭：协商解决观念差异	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构建稳定和诣的代际关系	对代际沟通能力、观念包容性要求较高
复制模式	权力不平衡致非自愿服从，转型期多表现为子代凭优势迫使亲代妥协的“逆复制”	1) 丁克家庭：部分青年以养老为筹码，迫使亲代接受不生育；2) 隔代抚育家庭：子代主导育儿，亲代被动服从	快速达成表面一致，减少即时冲突	积累代际怨恨，不利于代际关系长期和谐
原子化模式	矛盾难解致关系疏远，形成“互不打扰”状态，互动与情感联结弱化	1) 丁克家庭：因生育分歧减少往来；2) 隔代抚育家庭：因育儿观念差异关系淡化	避免直接冲突，减少矛盾升级	导致代际情感联结断裂，不利于家庭和谐与养老问题解决

## 5.2. 代际关系的调适路径

### 5.2.1. 构建平等协商的代际沟通机制

沟通是化解代际矛盾、达成共识的核心，构建平等尊重的现代代际沟通机制是实现代际和谐的基础。亲代应摒弃权威式互动逻辑，尊重子代在职业、婚恋等方面的自主权，以倾听者姿态理解其诉求。子代应正视亲代传统观念的历史语境，理性平和地向亲代解释自身选择。沟通中需直面生育、养老等核心矛盾议题，坦诚交流以减少认知偏差。沟通方式上，可借助微信等数字媒介破解异地沟通阻隔，同时重视面对面互动的情感价值，通过家庭相处增强沟通有效性，夯实代际情感基础。

### 5.2.2. 强化情感联结的核心纽带作用

情感是维系代际关系的精神纽带，以情感联结为核心导向，是破解代际功利化、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亲代与子代应超越物质交换，将情感陪伴、精神慰藉置于首位，回归家庭情感本质。亲代需关注子代压力与困境，提供情感支持；子代需关注亲代老年情感需求，通过多元形式给予精神陪伴。同时，结合不同家庭结构实施差异化策略——隔代抚育家庭通过共同参与育儿深化共识，全职儿女家庭借助日常相处消解观念隔阂。强化情感联结可缓解观念差异与权力冲突，推动代际关系和谐稳定。

### 5.2.3. 建立多元互惠的代际支持体系

代际支持是代际关系的重要实践载体，构建多元、互惠、可持续的现代代际支持体系，是代际关系良性发展的核心支撑。代际支持需突破单一物质支持模式，形成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支持三位一体的多元体系，实现亲代与子代双向赋能、互惠共赢。

经济支持维度，坚持“适度支持、双向回馈”原则。亲代可适度帮扶子代应对购房、育儿等压力，子代需履行对亲代的经济赡养义务，实现经济支持双向流动。生活照料维度，依托家庭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亲代可参与隔代抚育、家务劳作缓解子代压力，子代需承担亲代晚年的日常照料与健康护理责任。精神支持维度，注重代际双向滋养。亲代传递人生经验指导子代，子代给予亲代情感慰藉与陪伴，满足彼此精神需求。通过多元互惠的代际支持体系，推动代际互动形成“付出-回馈”的良性循环，助力代际关系良性发展。

### 5.2.4. 完善家庭友好的外部政策保障

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稳定，需家庭内部主动调适与外部政策体系支撑保障相结合。应立足社会实际，构建生育与养老友好并重的现代家庭政策体系，为代际关系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一是强化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扩大公立机构覆盖，完善服务标准，降低托育成本，缓解隔代抚育压力与子代育儿负担，化解相关代际矛盾。二是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金待遇，推进医养结合，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减轻子代养老照料压力，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三是完善代际互助激励政策，为隔代抚育老人提供补贴与技能培训，为承担养老责任的子代提供政策激励。四是加强家庭文化建设，依托多元平台，传播平等互惠的现代代际伦理，摒弃传统权威孝道，弘扬相互性孝道文化。

代际关系和谐是家庭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唯有实现家庭内部调适与外部政策支持有机结合，才能化解代际矛盾，推动传统代际关系向现代转型，构建平等和谐、互惠稳定的新时代家庭代际关系。

## 6. 结论

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多维度互动的结果，核心呈现四重转型特征：权力结构从父权主导转向双向协商，互动逻辑从责任强制演化至情感互惠，伦理价值从家庭本位发展为个体与家庭共生，居住模式从共居紧密转型为分居弹性。这一变迁推动了代际关系民主化，但也引发观念冲突、权

力博弈等困境。

代际关系现代转型受多重机制驱动，生育观念转型为核心诱因，资源分配调整为物质基础，伦理价值重构为文化内核，社会结构变迁为外部推力，四者交织发力。实践中，家庭形成四种代际矛盾应对模式，其中兼具平等协商的解放模式更具可持续性。

构建和谐稳定的代际关系，需家庭与社会协同发力。家庭层面建立平等协商机制，强化情感联结与互惠支持；社会层面完善生育与养老友好政策，提供制度化保障。未来，人口老龄化与个体化深入，将使代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后续相关研究可从三方面进一步拓展：其一，开展纵向追踪研究，深度解析代际关系的长期变迁规律与趋势；其二，聚焦单亲家庭、重组家庭、流动家庭等特殊家庭类型，探究其代际关系的实践特征与调适路径；其三，挖掘数字技术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机制，为化解数字时代的代际矛盾提供新思路。通过持续深化研究，完善代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可为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 参考文献

- [1] 齐鑫. 重构与延续：“丁克家庭”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的生成与调适[J]. 宁夏社会科学, 2025(4): 173-183.
- [2] 沈毅, 桂音希. 家庭主义与个体化之间：“新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变迁研究与展望[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4): 83-97, 159.
- [3] 丁志宏, 王伟成. 城市青年孝道观念变化及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5): 87-95.
- [4] 李鹏, 张奇林.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基于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J]. 社会建设, 2022, 9(4): 31-44.
- [5] 郑杨, 张艳君. 独立与依赖“隔代抚育”中代际关系的平衡与失衡[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6): 75-84.
- [6] 周恬恬, 苗国. 亲与孝：“全职儿女”的代际关系和行动伦理[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9): 5-13.
- [7] 鲁兴虎, 兰青. 融合与排斥都市“老漂族”代际关系矛盾心境分析[J]. 人口与社会, 2019, 35(2): 15-23.
- [8] 高玉春. 社会化视角下的丁克现象[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5): 87-94.
- [9] 刘汶蓉.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4): 145-168, 245.
- [10] 阎云翔, 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7(7): 4-15.
- [11] 康岚.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 青年研究, 2012(3): 21-29, 94.
- [12] 石金群. 独立还是延续当代都市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心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4): 35-40.
- [13] 王记文, 伍小兰. 家庭代际关系对中青年精神健康的作用——性别差异与年龄模式[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6): 98-108.
- [14] 吴帆, 冯丽琴. 中国城市居民代际居住安排：一项基于 CHARLS 的拓展研究[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2(3): 10-19.
- [15] 张波.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J]. 社会学评论, 2023, 11(6): 125-145.
- [16] 赵凤, 计迎春, 陈绯念. 夫妻关系还是代际关系？——转型期中国家庭关系主轴及影响因素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4): 97-112.
- [17] 赵方杜. 双重代际矛盾：青年“空巢”的家庭化逻辑与结构性约束[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4(4): 113-123.
- [18] 王瑜, 程令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与养老模式变迁[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2, 15(4): 115-120.
- [19] 杨慧康, 陈友华. 压缩现代性视角下城市家庭隔代抚养实践研究[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5(6): 118-131.
- [20] 王萍, 李贤, 潘霜.“距”“和”不可得兼？——距离视角下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及其机制[J]. 人口与经济, 2025(1): 61-77.